

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 法西斯的精神专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高 洪

内容提要：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近代天皇制政府为了增强其统治的“正统性”和“有效性”，拾起复兴中的神道教义，鼓吹“天照大神”庇护下的“皇国神运”。伴随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对外侵略扩张，神道与明治政府结合得愈加紧密，逐步成为君临天下的“国家神道”，进而国家神道终于超越了所有宗教信仰，成为国教。“德意日法西斯军事同盟”形成后，天皇制政府为了将日本国民牢牢地捆绑在军国主义战车上，在实行严酷的政治专制的同时，以国家神道统摄民众的精神世界，使近代日本国家发展走向歧途。

关键词：日本军国主义 国家神道 精神专制 日本法西斯

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从日本近现代历史上宗教与政治变化的关系来看，明治维新后，原本就蕴含着某些催化军国主义糟粕的神道教义，经过笃信“富国强兵”的政治家和国粹主义者的阐释，进一步强化与发展为“神国”思想，使“皇国观念”深入人心。随着侵略战争不断升级，法西斯军人政权在全国强化了“战时体制”，利用国家神道统摄其他宗教，对民众进行精神专制。

本文以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对内实施宗教整肃为着眼点，分析军国主义势力的高压政策留下的恶果及其沉痛历史教训，以警醒世人关注日本今天的政治发展方向。

一 “国家神道”统摄地位的形成过程

神道作为日本民族宗教产生于远古时期,但是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上,这种以崇拜山川草木中自然神灵的原发宗教并不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神道依附于佛教精神为核心的官方思想体系。尤其是到了封建社会晚期,在江户幕府卵翼下的佛教通过“檀家制度”为德川政权代行精神统治与户籍管理,高度世俗化的佛教教团和耽于享乐的僧侣成了旧制度的象征。与此相反,神道则被倒幕维新运动的志士用作对抗幕府意识形态的工具。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近代天皇制政府为了增强其统治的“正统性”和“有效性”,拾起复兴中的神道教义,鼓吹“天照大神”庇护下的“皇国神运”。于是,古代神道思想从倒幕志士用来冲击德川政权的精神武器,转化为政府不断用来强化民众的精神工具。不久,伴随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对外侵略扩张,神道与明治政府结合得愈加紧密,逐步成为君临天下的“国家神道”。

神道国教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治政府建立伊始。1868年3月30日新政府发布的《祭政一致、再兴神祇官告示》就已经显露神道政治化的端倪。早期的国家神道分为“官社国家神道”和“民社国家神道”。前者指皇族成员亲自担任祭主,各级神职人员隶属内务大臣并领取“官币”的神道;后者指各地政府所属的乡间神社,以祭祀亡灵、镇护地方安泰的“神饌币帛料金”为主要收入的神道。1870年,明治政府以天皇名义发布《大教宣布之诏书》,使神道成为以皇室为中心的政治性宗教体系,揭开了“国家神道”登场的序幕。1879年,东京的“招魂社”改为专门祭祀战争亡灵的“靖国神社”后,由陆军省与海军省共管,费用全部

由国库支付。此后,随着天皇制权威的进一步确立,“政府根据神道教的情况实行祭祀与宗教逐步分离,确立了促使形成国家神道的方针。1882 年 1 月,废止了神官的弘教兼职,官币神社的神官禁止参与葬仪等教化职能。……祭祀与宗教的分离导致国家神道形成,从实质上阻断了原有教派神道的宗教性质,神道功能被限定在祭祀上最终导致了‘国家神道’的出现”。“1889 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文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敬神崇祖为天皇制国家全体臣民必须履行的义务,事实上以国家根本大法形式肯定了国家神道对其他宗教的统治地位,国家神道终于超越了所有宗教,成为君临天下的国教。”

到了日俄战争以后,国家神道已经成为军部大本营直接用来为“圣战”祈祷的工具,先后修建了平安神社、明治神宫等专门祭祀天皇始祖及“皇国鸿运”的神社。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势力日益猖獗。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打击下,帝国主义加剧了瓜分、掠夺殖民地的矛盾斗争。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战争侵占我国东北,扶植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这一公然践踏国际准则、侵占邻国领土的强盗行径,也加剧了日本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并导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一度成为“与万国对峙”的孤立状态,并最终导致“德意日法西斯军事同盟”的形成,日本不断对外穷兵黩武直至走向败亡。

在此期间,天皇制政府为了将日本国民牢牢地捆绑在军国主义战车上,在实行严酷的政治专制的同时,以国家神道统摄民众的精神世界,使近代日本国家发展走向歧途。从 20 年代中期

参见村上重良:《国家神道与民众宗教》,吉川弘文馆,1983 年,第 13—14 页。

蒋立峰、高洪:《日本政府与政治》,台湾扬智出版社,2001 年,第 33 页。

起,日本政府就已经开始加强对传统宗教的控制。1924年春,首相破例在官邸召见神道、佛教和基督教的代表,要求他们配合政府对国民的教化活动。在这一要求的影响下,神道各个派系纷纷行动,设立起专职教化的教团联盟;佛教界在继净土真宗东本愿寺派发动“弘布国民精神作用诏书”的“大诏布衍讲演”之后,佛教联合会所属的僧侣、居士乃至一般信徒参加的春秋彼岸佛事上,也要拜读天皇的“振兴国民精神之诏书”。在政府的推动下,国家神道及其影响下的大部分宗教教团,俯首听命于世俗政治,临战则狂热鼓吹圣战,战终则祭奠战争亡灵,尤其是“满洲事变最初表现为‘宣扬国威’、‘武运长久’、‘祈祷胜利’等祝愿,这是由在乡军人、消防组、青年会、妇女会、小学校、自治工会、氏子等地方团体组织的有计划的动员。但到了战争行动趋向平息的1932年春天,活动中心就开始转移到祭祀战死者灵魂上来了。”这一变化导致各地、甚至是刚刚攫取的殖民统治区也开始大量兴建神道招魂社,祭祀大大小小的“军神”,使神道更加得到政府青睐,使相互利用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事实上,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国家神道力量不断增强,结果迫使其他宗教或者遭受镇压,或者亦步亦趋地成为军国主义势力的应声虫。“战时体制”确立后,神道教的“神国”、“神皇一体”等观念被军国主义者充分利用,“八纮一字”、“圣战”等内容被广泛运用于三四十年代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国家神道”已然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中外日报》1924年2月22日报道。

赤泽史朗:《近代日报的思想动员与宗教统治》,校仓书房,1985年,第109页。

江口圭一:《满洲事变与民众动员》,转引自古屋哲夫编:《日中战争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

二 法西斯军部对宗教的利用控制

军国主义势力强化国家神道的直接目的是为侵略扩张炮制借口,是用神圣的宗教光环减少民众对血腥战争的抵触。所以,天皇政府进一步发挥国家神道的“皇国观念”,每逢在国家战略上推出重大举措时,都要打出天皇旗号证明政治、军事行动符合“皇国观念”和祖宗遗留的宗教使命。甚至在图穷匕见的时候仍不肯放弃他们自认为可以遮羞的宗教招牌。例如,在 1940 年日本与德、意缔结“三国同盟”时,昭和天皇颁布诏书说:“宣扬大义于八纮,统一乾坤为一宇,实乃皇祖皇宗之大训,朕夙夜眷眷之所为。”同样,在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日本使节在递交给美国国务卿的声明中也还要给自己的偷袭寻找一点托词:“万邦各守本分乃日本帝国不可改动之国策……维持现状同万邦各守本分之帝国根本国策完全背道而驰,帝国政府断然不能容忍。”大概是应了自己的法西斯盟友戈培尔“谎话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的谏语,当太平洋战争之初日军顺利攻占新加坡,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陆战胜利时,日军大本营几乎自己也相信起“武运长久”的“皇国威力”,战报中公开宣称:“日本是照亮世界和平的太阳。沐浴在阳光下者茁壮成长,抗拒阳光者唯有毁灭一途。美英两国都应深思我日本千年炽热的历史。”可惜,军国主义者好梦不长,短短几年,驾着“神风”的特攻队员就喊着“天皇陛下万岁”栽进大海,天皇只能用投降来结束战争了。

其实,军部及其控制下的政府自己也知道自欺欺人的“皇国

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同上书,第37—38页。

转引自彭谦主编:《猛醒吧,日本》,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第225页。

的神运”根本吓不倒战争对手,更不会得到殖民地民众的认同。但是,反反复复地灌输“皇国观念”却足以麻痹本国民众的理性,使其在战争狂热中充当构筑“大东亚共荣圈”的炮灰。作为对宗教的全面控制,军国主义政府在“战时体制”下强行通过与《国家总动员法》相匹配的《宗教团体法》,用立法手段使宗教彻底成为为“圣战”服务的工具。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华战火扩大到中国全境。全面侵华战争激发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高潮。1937年9月,第一次近卫文磨内阁向国民发出“八纮一宇,尽忠报国,坚忍持久”三条口号,要求国民“举国一致”地开展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强化“战时体制”,将全国纳入“圣战”轨道。1938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这项58条条款的法律,通篇充斥着为“圣战”集中国力的战争动员,要求“最有效地发挥全国之力量,统筹使用人力物力资源”(第一条)。而且,从法律规定的征集物资、人力与产业之外,政府可以“根据敕令指定征集调用必要的物资”(第二条第九款),或“根据敕令指定征集调用必要的产业”(第三条第九款)。换言之,为了支撑对外侵略战争,军人政权可以在天皇名义下随意征用、占有一切个人、团体的资产,约束和支配个人和团体的行动。1940年9月19日,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与法西斯德国、意大利缔结同盟条约,联手制霸世界。军部控制下的日本政府,决定模仿德国纳粹党的一元专制体制,建立起由首相亲任总裁的大政翼赞会,把镇压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其他进步力量后仅存的社会大众党、政友会、民政党等几个资产阶级政党通通纳入其中。从此军政府彻底抛弃了“政党

《国家总动员法》、《宗教团体法》内容,引自《近代日本宗教史料》(佼成出版社,1973年)和《从史料读解近代》(论坛社1994年),下同。

政治”的虚伪外壳,形成了天皇大权下军部一手控制国家各个体系的“举国一致”的战争机器。

不久,文部省对神道、佛教和基督教进行了“精神总动员”。1941年12月,内外交困的法西斯军人政权铤而走险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整个宗教界都成了法西斯战争狂人的协从。到了1942年,“大日本宗教报国会”和“产业报国会”、“大日本妇女会”、“町内会”等组织先后加入了大政翼赞会。

“战时体制”的建立,强化了政治对宗教的干涉作用,使宗教界本身的发展走向发生扭曲。同时,《国家总动员法》更是极大地影响到宗教立法过程。

近代日本宗教立法的动议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1899年政府曾经在修改与欧美间不平等条约时,向贵族院提出过“宗教法案”。后来,佛教界发动的置佛教于国家保护之下的“佛教公认运动”未能通过。20世纪20年代,宗教立法再度提上政治日程,但同样由于教派间争端而告吹。1929年和1935年,政府两度提出的“以作为教化团体为振兴国民精神做贡献为宗旨”的“宗教团体法案”仍因不同教派相互排斥而搁浅。《国家总动员法》实施后,1938年11月,近卫文麿¹内阁的文部大臣荒木贞夫向宗教制度调查会咨询了“宗教团体法纲要”,又经过政府法制局修改,终于在1939年初两院通过了《宗教团体法》。荒木贞夫本身即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曾经在其编著的小册子《向全日本民族呼吁》中宣称,日本的“真正的使命是弘布和宣扬皇道以达于四海”。在这样的宗旨与全国总动员的高压环境下,“弘布和宣扬皇道达于四海”的“大义名分”取代了以往的宗教纷争,延宕已久的宗教立法非但没有达到维护信仰自

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第20页。

由的初衷,反而成了军国主义者利用宗教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

《宗教团体法》公布后,日本政府又于1941年将神道统编为13派,佛教统编为28派,基督教统编为两个教团。但实际上,整肃后的日本宗教界只有一种“宗教”,即法西斯政权卵翼下极尽其鼓吹圣战之能事的“国家的宗教”。今天,学术界一般认为《宗教团体法》的作用,一方面整顿统一了以往的宗教法规,同时强化了对宗教团体的保护监督。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军国主义政府对于作为社会实体存在的宗教团体,在确认法定地位的外衣遮盖下,对自由宗教采取了日益严酷的镇压与制裁,宗教信徒和一般国民统统沦为法西斯统治下的“顺民”。

三 高压统治下的“臣民之道”

天皇制政府教化臣民始见于1890年的《教育敕语》。1937年又制造出《国体本义》,讴歌“我天皇神威照耀下国运昌盛、向海外蓬勃发展”的局面,要求国民为了不辜负祖先圣德,要恪守臣节。在“政治、经济、军事”篇章里赤裸裸地宣扬“祖先以来的尚武国体”,引用明治天皇在1873年政府颁布《征兵令》时对陆海军发布的“敕语”,要求所有“大日本帝国之臣民”不忘天威同在,不辱皇军使命,弘扬国威,保全皇国等等。1941年,政府教学局编撰并在内阁局印制了《臣民之道》,用以规范民众的行为,使其符合战争需要。该书用天照大神建立神国的神话替代历史,强调“皇国臣民之道,源自日本之国体,在于扶翼、奉行天地无穷之皇运”。荒谬地说“当今之急务,在于彻底排除自我功利思想,昂扬实践以奉仕国家为第一要义的皇国臣民道路”。如

土方和雄:《日本文化论与天皇制意识形态》资料篇3,新日本出版社,1983年。

果说,《国体本义》和《臣民之道》还主要是灌输皇国思想,用以欺骗国民追随政府的侵略扩张的话,那么,与之相匹配的臭名昭著的《维持治安法》和《国家总动员法》,就更清楚地体现了法西斯政府施行宗教镇压的意图。就是说,一旦宗教活动发生妨害治安或有违政府意愿的行为,就能采取严厉的“思想犯保护观察”等取缔措施。

从20年代起,日益加紧宗教控制的日本政府就开始对敢于反抗的教团进行镇压,京都府警察部对大本教的镇压开了宗教整肃的先例。根据村上重良的研究,在15年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利用《维持治安法》和《国家总动员法》,在镇压社会主义运动的同时,对宗教组织严加管束。1936年,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夜镇压了提倡用社会主义运动合作促进佛教革新的“新兴佛教青年同盟”和“基督教学生社会主义运动组织”,其后又审查了“警世救国教”、解散了“天理研究会”等宗教组织。特别是《宗教团体法》出笼后,所有与国家神道教义不符的宗教活动均被严加惩戒,甚至连为配合战争疲于奔命的传统佛教教义和经典,也因有“番神”或含有不符合神道天照大神的神话而被没收。而今天创价学会前身创价教育学会,则因坚持反对祭祀伊势神宫的神札,于1943年遭到镇压,会长牧口常三郎病死在监狱里,其他干部被一直关押到战争结束。

完全从属于国家神道的神道教团以鼓吹战争为己任,传统的佛教宗派(如净土真宗等)为了自保,竟然也打着太平鼓去鼓励出征的皇军将士。至于胆敢不配合战争的宗教组织,如救世军、圣公会等则动辄受到监控或取缔。而歌颂战争的神道则大

当时发生了镇压日莲宗供奉《法华经》事件及名古屋宪兵队和爱知县警署特高科传讯曹洞宗下属教团、没收经典的事件。

行其道,连政府中的神道局,也在1940年的“纪元节2600周年”典礼上升格为“神道院”。按照日本学者的分析:“‘九一八’事变后,神道地位急剧上升,神道上扬的第一个理由是基于神道祈祷战争获胜,这对于胜负难料的战争赌博,以及在‘武运长久’名目下出征的士兵安全生还很重要;第二个理由是国家神道中不存在超出国家观念的普遍规范,把战争这种国家行为完全正当化的原因。其根源在于强化国家的自我肯定意识。”1944年,神道、佛教和基督教结成“大日本宗教报国会”,作为“大政翼赞会”的一环鼓吹国家主义,为军国主义侵略歌功颂德,并对信徒作战争动员,完全丧失了宗教原有性质。

四 法西斯精神专制的历史教训

法西斯政权对民众的精神专制早已成为过去,但这沉重的历史教训依然值得人们记取和深思。因为即使在今天,日本社会不时泛起的“皇国史观”、“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等明显带有复活“大东亚共荣圈”旧梦色彩的言论,一直在提醒人们以史为镜鉴的必要性。

法西斯政权对民众实施精神专制的恶果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它取缔了宗教自由精神代之以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压。由于国家政权处于阶级社会上层建筑的顶端,其核心地位对于社会各方面意识形态有着深刻影响,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情况下,登峰造极的军国主义政权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这些社会意识为了求得生存而自保,往往屈从于强权的欺压,在统治性社会意识的高压下苟活下去。这种精神上的专制,在具体社会运动方面则表现为非正统社会意识主体的人群对国家政

权的妥协和依附。“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宗教便是如此。

第二,法西斯政权对民众的精神专制煽动起民间空前的对外战争狂热,而来自社会底层的战争热望又反过来推动着国家机器更快地走向军事冒险,于是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尽管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占领军总部(GHQ)为铲除孳生军国主义的温床,先后发布了“禁止传播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美国对战后日本的第一号文书》,以及《关于严禁政府保证、支援、保全、监督及弘布国家神道之要件》(即著名的“神道指令”)、《废除对政治、民权及信教自由的限制》(即迫使天皇放弃“现人神”身份的“人间指令”)。但这些荡涤神道教义糟粕的努力并未能从根本上清除日本文化基因里的不良因素。随着日本重新崛起成为经济大国,其民族优越感又在逐渐抬头,冷战结束以后民族主义势力陡然增强,新世纪来临之后,一股股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的潮流在社会上涌动。

第三,由于法西斯政权对民众进行了长时期精神专制,使日本国民的精神处于麻木状态,由此可以洞悉日军在历次侵略战争中的残暴行径以及日本民众在战时狂热支持政府侵略政策的思想根源。更为严重的是,日本国民在战争结束后仍无力进行彻底反思,尤其缺乏对非正义战争罪行的深刻自省。战后初年,佛教界曾发起“一亿人总忏悔”活动,但此举也仅仅停留在慈悲众生怜悯死者的浅表层面,至于战前佛教界的反战运动也大多停留在“春秋无义战”的认识水平,即对所有战争性质不加区分地否定。结果,导致了今天许多日本国民念念不忘其遭受盟军空袭及原子弹轰炸的损害,而不愿或很少提及诸如南京大屠

参见杨曾文、源了园主编:《中日文化交流丛书 宗教卷》近代部分,大修馆,1996年。

杀之类的对亚太地区各国施加的暴行。凡此种种,都表明日本人判断对外政策是非得失的标准仍然是功利性的,缺乏道义原则,这些无不与日本天皇制政府和法西斯势力毒化民众价值观与思维模式的影响有关。

第四,原本就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道德思想,也缺少国际关系中的平等观念的日本宗教本身,由于军国主义势力的控制、压榨发生了畸变。诚如西方学者桑索姆所说:“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说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与道义相反,日本民族崇尚力量。30年代挑起侵华战争时,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几乎没有反对意见。40年代初准备对英美开战时,鉴于对手实力强劲反对意见者较多。但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多数日本人都把在国内受到的种种限制与压力转向外部,支持政府的扩张目标,在发动侵略战争、进行不平等的经商贸、殖民式的移民垦荒中寻求出路。即使在今天,许多新一代日本人士在对二战进行检讨时,多数的看法还是认为对美开战是因对力量对比判断失误而导致太平洋战争失利的,因此属于决策错误,很少真诚地从人道与国际平等的立场出发反省对中国及亚洲各国所犯下的罪恶。正是因为如此,今天的政治家才会一面在国际压力下做出忏悔的姿态以敷衍了事,同时又念念不忘去参拜供奉着甲级战争罪犯的靖国神社。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军国主义在日本近代历史上的流毒甚广,穷兵黩武的思想成分有着极深的文化渊源,这些因素在功利导向的多维相对主义思维模式也在日本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盛行不衰,甚至可能在新形势下造成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潜在威胁,对此作为曾经饱受日本军国主义祸患的中国人民,有理由要求日本正视过去的历史,同时自己更应保持高度警惕。

(责任编辑:张义素)